

超越蓝与绿? 台湾主流媒体意识形态与网络舆论交互影响研究

乐媛,刘君琳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网络舆论的兴起能否在实质意义上挑战台湾主流媒体的政治话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台湾网民对于传统媒体报道中所设置框架的反抗,甚至反过来影响传统媒体的能力。本文以“陈光标事件”在台湾掀起的舆论风波为分析案例,旨在考察当涉及两岸的非政治事件被呈现于主流媒体与网络讨论时,蓝绿意识形态是否依然起作用并如何影响二者间的互动。研究发现,网络舆论与媒体报道在态度与框架选择上并不完全一致;泛绿平台上的报道与网民舆论在事件发展的中后期相互影响,且网络舆论开始反作用于报道;媒体对于网络舆论的议程设置能力依然存在,但并不意味着更好的框架互动效果。研究肯定了台湾网民对传统媒体的挑战能力,并揭示了更为复杂的互动关系,其中意识形态扮演了重要角色。

关键词:台湾;意识形态;媒体;网络舆论;框架

中图分类号:G20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1590(2013)04-0070-09

一、引言

互联网作为虚拟的公共空间被网民寄予厚望,因为和其他形式的讨论空间相比,网络更具可接近性,更可能实现跨阶层跨领域交流。然而,接近的可能性并不代表接近的平等性。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是少数网站、个体拥有大多数的互联网链接,成为实质上的意见领袖,或至少是信息领袖。大多数的网民只能通过回复评论等方式在某一特定网络空间聚集。这种同质化的倾向往往又与互联网的协同过滤机制相关。^[1]

出于认知平衡的需要,网民寻找与自己的意见、观念一致的信息来源而对与自身价值观念相左的内容敬而远之。这在政治领域表现为不同网络空间的意识形态差异。这种差异与线下传统媒体自觉或不自觉所呈现的价值判断倾向相似。在台湾,线下的媒体,如《联合报》和《自由时报》,表现出明显的蓝绿分歧;而在线上,它们所创设的电子平台仍然未消弭这种意识形态的隔阂。

就政治传播而言,这些传统媒体不仅协助传递着不同偏向的政治信息,同时也通过议程设置、框

基金项目:福建省社科规划项目“超越制度决定论:两岸互联网政治参与比较研究”(2012C103);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
研究青年基金项目“超越制度决定论:两岸互联网政治参与比较研究”(13YJC860015)

作者简介:乐媛,女,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助理教授,博士;
刘君琳,女,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架等机制积极建构有意识形态偏向的“政治事实”。在这个传播结构中,民众作为政治行动者,相对于政党等政治组织,长期处于被边缘化的位置。当现实的媒体与受众的关系来到虚拟空间,当线下的互动转移到线上,情况是否发生改变?对于网民而言,网络可能只是另一种形式的大众媒体,也可能是近乎理想化的公共领域。这或许要取决于网民对于传统媒体所构建的框架的反抗,甚至有反过来影响传统媒体的能力。换言之,网络空间的网民舆论反馈是否与媒体报道的态度倾向、新闻框架出现差异?是媒体先于舆论构建框架还是舆论先于媒体,亦或二者在时间先后上并无联系,某种程度上,都体现了网民对传统媒体挑战能力的高低?

为了考察互联网是否实质挑战传统媒体传播结构这一问题,我们需要一个能在不同意识形态的媒体和网络舆论间引发持续关注的案例,以便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考察媒体与舆论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且这一案例需要既具有政治上的敏感性,如涉及两岸、“独”统等潜藏议题以使媒体拥有政治化操作的空间,同时又具备可引发民众跳脱蓝绿对立共同反思台湾社会问题的可能性。由于这一案例本身的多面性和复杂性,相异的意识形态能够用各自的框架解释事件,从而具有框架的差异性和某种程度上的传递性。引发台湾蓝绿媒体及网民热议的“陈光标赴台捐款”事件正符合这些标准:两岸问题和贫富差距使得新闻报道和网民舆论在政治和社会角度都可以有“一番作为”,而“可以”与“实践”之间的差距正是框架选择的表现。

因此,本研究以“陈光标事件”为切入点,通过探讨新闻报道与网民舆论之间主旨态度、框架形成的相互关系来分析网络空间的媒体与网民力量博弈状况,同时探究意识形态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换言之,研究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台湾主流媒体意识形态与网络舆论是否交互影响,怎样影响?意识形态在其中又扮演怎样的角色?

二、文献综述

(一) 框架:与议程设置的比较

1972年,Maxwell E. McCombs和Donald L. Shaw提出议程设置理论,指出大众媒体能够为公众设置“议程”,决定哪些是重要议题。^[2] McCombs和Shaw证实了议程设置假设的主要思想并引入诸多中介因素,例如社会类别、媒介使用的变化方式和接触媒介的频率等等,说明媒介提出的议程和公众对问题重要性的认识不是简单的吻合。^[3]

在议程设置理论获得广泛认可不久,Erving Goffman将“框架”概念引入文化社会学,用来指代人们用来认识和解释社会生活经验的一种认知结构。^[4]这一概念的提出与议程设置理论密切相关,甚至许多研究者认为议程设置效果和框架效果谈论的是同一种现象。^[5]其他学者则以不同的视角看待框架和议程设置的关系。McCombs把框架看做是议程设置的第二层语言,^[6]而Gamson认为框架的内涵超出第二层议程设置的定义。^[7]也有学者认为二者在理论层面上是各自独立的理论体系,但在具体的方法层面上互为他山之石。^[8]总之,看待议程设置与框架关系的方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定义“框架”的方式。^[9]

普遍被接受的“框架”定义源于恩特曼。恩特曼和Robert M.认为框架主要牵涉了选择与凸显两个作用,框架一件事件的意思,是将对这件事所认知的某一部分挑选出来,在沟通文本中特别处理,以提供意义解释、归因推论、道德评估、以及处理方式的建议。^[10]台湾学者臧国仁进一步对之做出补充,认为框架的中层次结构包括主要事件、主要事件发生前后的时间变量(先前事件、历史、结果、影响),以及主要事件的归因与评估。^[11]换言之,议程设置理论指出媒体可以告诉公众想什么,框架理论则指出媒体可以告诉公众怎么想。

影响框架的因素很多,与本研究相关的是对框架与意识形态之间复杂关系的发现。研究者认为,意识形态支配着新闻叙事框架的建立,^[12]也影响了受众对事件的看法,^[13]而框架却改变了受众意识形态与情感的关系。^[14]这些发现暗示意识形态的差异可能影响框架的互动。

(二) 网络框架

大多数研究者发现不同媒体平台发布的新闻使用的报道框架并不相同。以传统媒体为背景的新闻网站与商业性门户网站的新闻频道就具有明显差异,前者发挥网络媒体的舆论引导功能,后者则站在受众的角度去报道新闻,以一种民生视角,平视社会和民众。^[15]内地、香港、新加坡和台湾等地的网站也呈现出不同的报道框架。^[16]

同时,网络框架又不仅局限于上述网络新闻报道框架,还包括网络上的网民舆论框架,体现公众对事件的看法。研究者发现,公众对于传统媒介在固有的话语框架内的新闻报道已经产生某种疲惫与不能满足之势,而网络传播的出现正在悄悄地改变这一现状。^[17]然而,网络舆论比媒体报道更易出现极化的现象也引发了研究者的担忧。^[18]

进而,针对新闻报道框架与网民舆论框架的互动研究发现,新闻报道框架会显著影响受众评论立场,^[19]但网民舆论也介入并重构了报纸媒体新闻框架。^[20]本研究将对这些发现重新进行验证。

(三) 框架理论视野下的“陈光标事件”

当框架理论聚焦到台湾社会的具体语境时便延伸出了“台湾特色”。在台湾的政治生活中,无论是媒体还是民众都或多或少具有自己的政治倾向。简单用颜色划分,有以国民党、亲民党、新党等为主导的泛蓝阵营和以民进党、“台联党”等为主导的泛绿阵营等。泛蓝和泛绿对同一事件的框架选择往往大相径庭,尤其在对待与大陆相关事件的态度上。

针对大陆富商陈光标赴台捐款这一事件,两大阵营最大的分歧或许就在于如何看待大陆在其中扮演的角色。陈光标2011年1月26日去台湾开展济贫活动,媒体在事前事后都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报道。大陆富商的身份使部分媒体和民众以两岸视角解释事件,认为陈光标赴台捐款事件将同ECFA一样,“全部加记在大陆的‘涉台资产负债表’的借方,借方金额愈大,台湾将来愈是动弹不得”。^[21]进而,以此为借口进行政党攻击。泛绿阵营的部分成员更直接指责这是当局无法照顾人民的无能。^[22]这些政党攻击构成了解释事件的政党框架。

当然,抛开两岸和政党不谈,这一事件本身也具有相当的争议。一方面它反映出社会中的贫富差距,另一方面陈光标自身高调的作风也引来慈善文化与儒家传统的讨论。一些媒体和民众用“富人”、“穷人”讨论事件,用“社会救助”来思考事件,从阶层角度构建出这一事件的社会框架。^[23]还有一些民众则从做慈善的方式、儒家所推崇的“行善不为人知”来看待事件,形成解释事件的文化框架。^[24]

总而言之,从陈光标来台之前一直到2011年2月1日他离台之后一段时间内,这一事件都以其丰富的内涵成为线上线下、媒体民众热议的焦点。媒体和网民使用的框架不尽相同,而意识形态又在其中发挥作用。

据此,我们提出以下两个假设和两个探索性问题:

H1: 蓝绿媒体平台上的网民舆论与平台所属媒体报道的主旨态度有显著差异,而且网民舆论比新闻报道的态度极化程度大。

H2: 蓝绿媒体平台上的网民舆论框架与平台所属的媒体的新闻报道框架有显著差异。

R1: 泛蓝媒体与泛绿媒体,哪个媒体的议程设置更为有效?

R2: 新闻报道框架是否受到网民舆论框架的影响,泛蓝媒体与泛绿媒体相比,哪个媒体受到的影响更大?

三、研究思路

本研究采用的是从泛化到细化、从整体到局部的研究思路。首先从直观上评价蓝绿媒体平台上新闻报道与网民舆论的倾向差异;进而从整体来看新闻报道与网民舆论的框架选择差异;最后细化到事件的每一个发展阶段,看新闻报道与网民舆论的差异与交互作用。在考察新闻报道与网民舆论的框架互动时参考了 Yuqiong Zhou 和 Patricia Moy 的研究,^[25]亦即图 1 所展示的研究思路。

图 1 展示的是,研究在考察了新闻报道与网民舆论的态度倾向和整体框架选择有何异同之后,分阶段考察这些异同是如何造成的:比较同一阶段的新闻报道和网民舆论框架是考察框架互动的即刻影响,比较某一阶段的新闻报道(网民舆论)框架与前一阶段的网民舆论(新闻报道)框架是验证框架互动的延时效果。举例来说,如果前期的新闻报道框架与中期的网民舆论框架无显著差异,或许就意味着前期的新闻报道对中期的网民舆论产生了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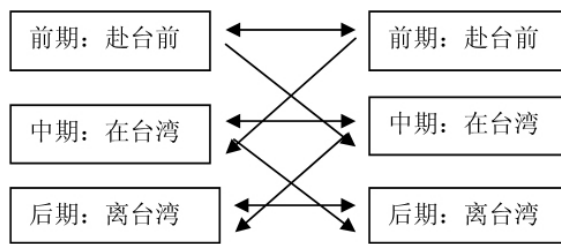


图 1 框架交互作用

进而考虑到框架理论与议程设置理论的密切关系,研究在最后补充了对每日新闻报道量(主帖数目)与网民评论量(回帖数目)的相关性考察。这些数据将从侧面验证媒体报道与网民舆论的互动情况。

四、研究方法

(一) 样本抽取

本研究采用内容分析法,将《自由时报》电子报和联合新闻网 2011 年 1 月 24 日至 2 月 2 日与“陈光标赴台捐款”事件相关的新闻报道(主帖)及其网民回帖作为分析单位。其中,网络上的主帖与纸媒(《自由时报》和《联合报》)的内容完全相同,回帖则是网民针对每一主帖所作出的评论。一般认为《自由时报》具有泛绿倾向,《联合报》具有泛蓝倾向。

统计帖子数量可得,《自由时报》的报道 67 篇,网民的回帖 698 篇,《联合报》的报道 145 篇,网民的回帖 3 474 篇。

(二) 变量的操作化

首先,研究采用 5 度李克特量表“强烈反对”1—“强烈支持”5)来测量两个发帖平台的媒体和网民对于陈光标理念及行为的主旨态度。

接着,根据文献综述和台湾社会语境,我们将“主导框架”划分为“两岸框架”、“政党框架”、“阶层框架”和“文化框架”,具体分类如表 1:

表 1 主导框架的划分与关键词

主导框架	操作定义	关键词
两岸	以两岸现状的社会情境作为解释框架	大陆、中国、两岸、共产党等
政党	以党派蓝绿意识形态差异作为解释框架	国民党、民进党、马政府、朱立伦、蔡英文、陈水扁等
阶层	以阶层差异、贫富分化等社会情境为解释框架	富人、穷人、官宦子弟、郭台铭、社会福利、不买名牌、富豪等
文化	以台湾社会主流所认同的文化与传统价值作为解释框架	财大气粗、暴发户、钱墙、为善不欲人知、嗟来之食等

同时,我们以“事件发展阶段”和“发帖日期”作为时间变量,考察框架的变化过程。“事件发展阶段”以陈光标的赴台离台行程进行划分,分别为“陈光标赴台前(1 月 24 日—1 月 26 日)”、“陈光标入境后(1 月 27 日—1 月 31 日)”和“陈光标离台后(2 月 1 日以后)”。

五、数据分析

(一) 主旨态度分布

不同意识形态下的新闻报道与网民舆论对陈光标事件的态度并不相同。在同一意识形态影响

下,新闻报道与网民舆论的主旨态度也不尽相同。

同时,就偏度和峰度而言,无论是新闻报道还是网民舆论,偏度都不等于0,表明主旨态度的分布都是不对称的,具有一定的偏斜程度。偏度越接近0,偏斜程度就越低。峰度大于0,为尖峰,数据的分布更集中;峰度小于0,为平峰,数据的分布更分散。可以看出,无论是新闻报道还是网民舆论,主旨态度的分布都比正态分布更为分散(如表2)。

表2 主旨态度分布

主旨态度分布	N	极小值	极大值	均值	方差	偏度	标准误	峰度	标准误
《自由时报》报道	67	1	5	2.42	1.065	0.099	0.293	-0.763	0.578
《自由时报》网民舆论	698	1	5	2.42	2.095	0.560	0.093	-1.069	0.185
《联合报》报道	145	1	5	3.46	0.834	-0.108	0.201	-0.060	0.400
《联合报》网民舆论	3474	1	5	3.63	1.499	-0.605	0.042	-0.426	0.083

《自由时报》的新闻报道与网民舆论的主旨态度均值为2.42,无显著差异($F = 20.310, df = 92.956, p = 0.989$),表明无论是新闻报道还是网民舆论的主旨态度基本介于中立和一般反对之间。二者偏度都大于0,说明主旨态度的分布为右偏分布。新闻报道的偏斜程度小于网民舆论,根据 DiMaggio, P. J. Evans 和 B. Bryson 的研究,^[26]这表明相较新闻报道而言,网民舆论具有态度极化倾向。

《联合报》的新闻报道与网民舆论的主旨态度分别为3.46和3.63,有显著差异($F = 23.082, df = 166.387, p = 0.032$),虽然无论是新闻报道还是网民舆论的主旨态度都介于中立和一般支持之间,但是网民舆论比新闻报道更支持这一事件。二者偏度都小于0,说明主旨态度的分布为左偏分布。新闻报道的偏斜程度小于网民舆论,网民舆论同样具有态度极化倾向。

以上发现说明,虽然媒体网络平台上的网民舆论与新闻报道的主旨态度不一定相同,但网民舆论比新闻报道具有更强的态度极化程度,H1得到部分支持。

(二) 新闻报道与网民舆论的框架差异

新闻报道与网民舆论的主旨态度在两个平台上不完全相同,暗示二者的框架也将呈现差异。图2和图3验证了这个想法:新闻报道与网民舆论的框架具有显著差异。无论是《自由时报》还是《联合报》,相较新闻报道框架而言,网民舆论框架更多以两岸、阶层、政党框架诠释事件,更少以文化框架诠释事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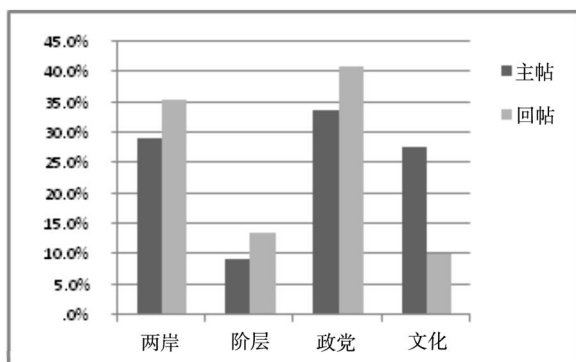


图2 《自由时报》新闻报道与网民舆论框架比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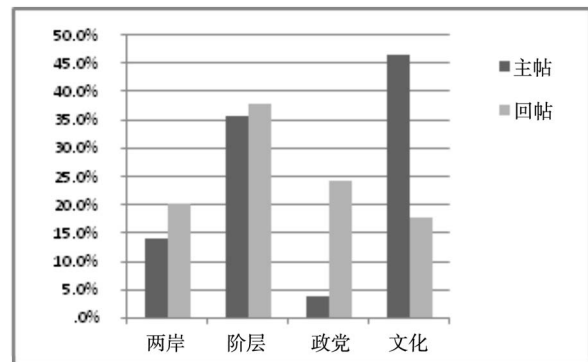


图3 《联合报》新闻报道与网民舆论框架比较

《自由时报》的新闻报道框架与其网络平台上的网民舆论框架有显著差异($\chi^2 = 19.233, df = 3, p < 0.001$)。相较报纸上的新闻报道框架(两岸29.2%,阶层9.2%,政党33.8%,文化27.7%)而言,更少比例的网民舆论是以文化框架(10.0%)来诠释陈光标事件,而以两岸(35.5%)、阶层(13.4%)或政党

(41.0%) 框架诠释事件的更多。《联合报》也呈现出这种差异($\chi^2 = 87.281, df = 3, p < 0.001$) , 相较报纸上的新闻报道框架(两岸 13.9% , 阶层 35.8% , 政党 3.6% , 文化 46.7%) 而言 , 更少比例的网民舆论(两岸 20.3%、阶层 37.8 , 政党 24.2% , 文化 17.7%) 是以文化框架来诠释陈光标事件。这说明 , 无论蓝绿 , 媒体平台上的网民舆论框架与平台所属的新闻报道都不同 , H2 得到支持。

(三) 框架的分阶段交互作用

首先 , 我们将事件发展不同阶段的新闻报道与网民舆论的框架进行比较 , 发现在事件发展的前期和中期 , 《自由时报》的新闻报道与网民舆论框架具有显著差异($\chi^2 = 18.995, df = 3, p < 0.001$; $\chi^2 = 10.326, df = 3, p = 0.016$) , 但在事件发展的后期 , 二者并无显著差异($\chi^2 = 2.598, df = 3, p = 0.458$) ; 而在事件发展的各个阶段 , 《联合报》的新闻报道与网民舆论框架都具有显著差异($\chi^2 = 66.599, df = 3, p < 0.001$; $\chi^2 = 34.954, df = 3, p < 0.001$; $\chi^2 = 16.751, df = 3, p = 0.001$) 。

接着 , 为了考察新闻报道对网民舆论的影响 , 我们将新闻报道框架与网民舆论框架按照“事件发展阶段”错开并分别进行比较。数据分析显示 , 《自由时报》中期的网民舆论与前期的新闻报道、后期的网民舆论与中期的新闻报道有显著差异($\chi^2 = 12.584, df = 3, p = 0.006$; $\chi^2 = 14.084, df = 3, p = 0.003$) , 说明《自由时报》的新闻报道对网民舆论并无延时影响。《联合报》也是如此($\chi^2 = 164.862, df = 3, p < 0.001$; $\chi^2 = 15.258, df = 3, p = 0.002$) , 没有表现出新闻报道对网民舆论明显的延时影响。

进而 , 我们考察了网民舆论对新闻报道的反作用 , 发现《自由时报》中期的新闻报道与前期的网民舆论有显著差异($\chi^2 = 15.351, df = 3, p = 0.002$) , 后期的新闻报道与中期的网民舆论无显著差异($\chi^2 = 5.568, df = 3, p = 0.135$) , 说明《自由时报》的网民舆论在事件发展的中期开始影响到后期的新闻报道 ; 而《联合报》中期的新闻报道与前期的网民舆论、后期的新闻报道与中期的网民舆论有显著差异($\chi^2 = 14.006, df = 3, p = 0.003$; $\chi^2 = 25.687, df = 3, p < 0.001$) , 说明在《联合报》的网络平台上并没有表现出网民舆论对新闻报道的反作用。

这些数据表明 , 就解释事件的角度而言 , 蓝绿媒体网络平台上的新闻报道与网民舆论的关系不完全相同。《自由时报》的中期网民舆论与后期新闻报道相似 , 后期新闻报道又与后期网民舆论相似 , 显示出事件发展中后期新闻报道与网民舆论的交互影响 , 网民舆论甚至开始反作用于新闻报道。与之相较 , 《联合报》的新闻报道与网民舆论之间保持了较高的独立性 , 相互之间既无即刻的影响又无延时的作用。

(四) 报道量与评论量之间的关系

虽然陈光标事件吸引了媒体和网民的共同注意 , 但图 4 显示网民讨论这一议题的兴趣(回帖量)

并不完全伴随着媒体报道的程度(主帖量)而变化。《联合报》的新闻报道量与网络评论量显著相关($r = 0.717, p = 0.02$) , 《自由时报》的新闻报道量与网络评论量却不相关($r = 0.038, p = 0.916$)。^[27] 换言之 , 泛蓝媒体成功让媒体热点变为舆论焦点 , 而泛绿媒体在这一方面略为逊色。

综合框架的分阶段交互作用分析和报道量与评论量关系考察 , 可以推论泛蓝媒体

比泛绿媒体在设置舆论焦点方面更为有效 , 而相较泛蓝媒体 , 泛绿媒体的新闻报道更易受到网民舆论框架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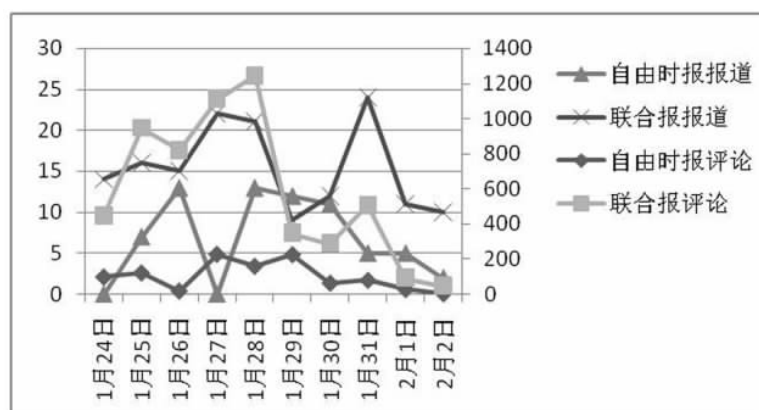


图 4 媒体报道量与舆论评论量

六、结论和讨论

(一) 框架的差异与交互作用: 网民舆论对新闻报道的挑战

首先,本研究肯定了网民舆论对媒体的挑战能力。泛绿平台上的新闻报道与网民舆论在事件发展的中后期相互影响,网民舆论甚至开始反作用于新闻报道(见图5),而泛蓝媒体的新闻报道与网民舆论之间保持了独立性,相互之间既无即刻的影响又无延时的作用,网民舆论未受媒体新闻报道干扰,媒体报道也未被网民舆论左右。前者主动,后者被动,都是网民舆论对新闻报道的反抗方式。

对框架的比较也支持了上述发现。当媒体报道在频繁使用“文化框架”来构建新闻话语时,网民的解释框架更多聚焦于政党问题和阶层分化。这或许是因为对于陈光标事件来说,台湾民众更在意的是政党的执政能力与人民的生存状态,而非“尊严受辱”这样的文化问题。这一发现表明,从解释事件的角度来看,网民舆论已经开始摆脱新闻报道的视角限制,发展出独特的事件归因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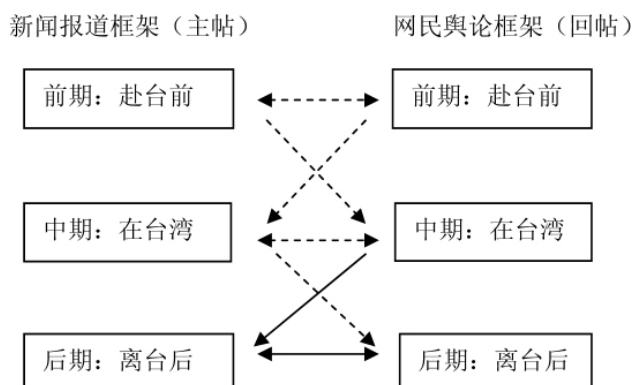


图5 泛绿平台上的框架交互作用

然而,网民舆论对新闻报道的反抗并未完全体现在态度倾向上。虽然泛蓝媒体平台上的媒体报道与网民舆论在主旨态度上有显著差异,但是泛绿媒体平台上的网民舆论态度倾向与其平台上的媒体报道倾向表现出高度一致性。尽管如此,网民有了构建框架的权利,甚至还具有一定的挑战媒体框架的能力,这无疑是网络时代舆论的一大特点。这些发现支持了此前 Yuqiong Zhou 和 Patricia Moy 的研究发现:媒介框架并未给网络话语设置框架,网络舆论与报道具有框架互动。^[28]然而,本研究认为,这种框架互动是分阶段的,并受意识形态影响。

(二) 新闻报道与网民舆论的框架互动: 分阶段与意识形态影响

Yuqiong Zhou 和 Patricia Moy 已经暗示媒体报道与网络舆论的框架互动具有阶段性:舆论对媒体报道有显著的框架形成作用只发生在早期报道中,而同期的媒体框架和网络舆论框架具有显著的交互作用。^[29]本研究在此基础上,重新验证了框架互动的阶段性,也支持他们有关“媒体框架没有为在线论述设置框架”的发现,但否定了网络舆论对媒体报道的早期影响,也不支持同一阶段线上线下框架具有显著交互作用的发现。

本研究发现,框架的互动主要发生在中后期阶段,同期的新闻报道框架和网民舆论框架有显著差异。这或许是因为研究选取的案例不同——Yuqiong Zhou 和 Patricia Moy 的研究个案起初只是地方性犯罪案例,审判不公才引起全国范围的网络舆论声讨,而本研究的个案从一开始就引起台湾岛内媒体和网络舆论的广泛关注,因此在事件发生的早期缺少一个媒体跟进网民舆论或网民舆论追随媒体的过程。另一方面,本研究引入了意识形态这一变量对框架的互动进行划分,这可能使得此前笼统的框架互动描述不足以描述新闻报道和网民舆论在政治倾向上的分歧。

正如前文所述,多位研究者证实框架形成确实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Edelman 声称,新闻框架由占支配地位的精英阶层的意识形态和偏见驱动,而非缜密的分析或解决社会问题的强烈愿望驱动。^[30]Reta 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主流意识形态是框架的主要来源。他们共同强调了意识形态对框架形成的重要作用。^[31]本研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意识形态和框架互动的重要关联,指出框架互动也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

(三) 框架互动: 与议程设置的关系

本研究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发现是: 尽管泛蓝媒体的网络平台上媒体报道数量与网络评论量高度关联, 泛蓝媒体为公众(网民) 设置了议程, 然而新闻报道与网民舆论却并未显示出明显的框架互动; 泛绿媒体的网络平台恰恰相反, 媒体报道与网络评论在数量上并无关系, 但是二者的框架互动(尤其是事件发展的中后期) 却较为明显。

一方面, 本研究通过对报道量和评论量的关联分析, 肯定了议程设置在网络时代的作用, 媒体依然能决定网民关注什么。泛蓝媒体平台上的网民舆论与新闻报道在数量上高度关联, 而泛绿媒体平台上报道量与网民回帖量并无关系——这很大程度上与媒体议程设置有关, 泛蓝媒体一开始就把这个事件放在报道的显要位置, 而泛绿媒体却忽略了它。在考察的时间段内, 泛蓝媒体的报道没有一日少于 5 篇, 而泛绿媒体则有日报道量为零的时候。报道量体现了议程设置, 议程设置又是关联意识形态的有意选择。《自由时报》不关注陈光标事件或许是因为该议题并不适合泛绿阵营发挥。在这一事件中, 《自由时报》偏好从“统独问题”和“马英九无能”两方面着手, 前者有违两岸和平发展现状且有牵强附会之嫌, 后者事关民生却难免物伤其类——底层民众的生存困境与两党都不无关系。相反, 泛蓝阵营在两岸问题上有更缓和的态度和更从容的立场, 在社会民生方面也有作为执政党必须站出来的理由。

另一方面, 较多的报道量以及由此引发的较多网络评论量, 并不意味着更好的框架互动效果。本文揭示了更为复杂的互动关系, 在这个关系当中意识形态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尽管要说超越蓝绿为时尚早, 台湾主流媒体的优势地位也未完全被打破, 但网民在框架解读上还是具备了一定的独立性。在媒体忽略的事件报道(如泛绿媒体之于“陈光标事件”) 中, 网民舆论甚至促进了媒体报道框架的形成, 而二者在同期也具有明显的框架交互作用。

本文认为在台湾主流媒体与网络舆论的框架互动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一种博弈的力量: 党派意识对媒体的强力渗透甚至是共谋, 与网民在新的平台上尝试以主流媒体框架以外的角度来表达独立观点的努力。这种抗拒被媒体绑架的意识与话语建构已经在网络上浮现出来, 正在逐渐形成一股重要力量, 伴随着新技术的演进而逐渐成为有可能打破两岸政治隔阂的契机。

注释:

- [1] 凯斯·桑斯坦《网络共和国》, 黄维明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
- [2] McCombs M. E. & Shaw D. L. “The Agenda Setting Function of the Mass Media”.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1972, 36 (2): 176-187.
- [3] 殷晓蓉《议程设置理论的产生、发展和内在矛盾——美国传播学效果研究的一个重要视野》,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9 年第 2 期。
- [4] Erving Goffman. *Frame Analysis: 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 [5] 彭泰权《大众传播的议题属性设置效果——美国议程设置理论的研究进展》, 《国际关系学院学报》, 2003 年第 5 期。
- [6] McCombs. “New Frontiers in Agenda Setting: Agendas of Attributes and Frames”. *Mass Communication Review*, 1997, 24(1&2): 32-52.
- [7] Gansman, W. A. *Talking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 [8] 张洪忠《大众传播学的议程设置理论与框架理论关系探讨》, 《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1 年第 10 期。
- [9] David H. Weaver. “Thoughts on Agenda Setting, Framing, and Priming”.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07, 57: 142-147.
- [10] Entman & Robert M. “Framing: Toward Clarification of a Fractured Paradigm”.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993, 43 (4): 51-58.
- [11] 臧国仁《新闻媒体与消息来源: 媒介框架与真实建构之论述》(第 1 版), 台北: 三民书局, 1999 年。
- [12] Akhavan-Majid, R. & Ramaprasad, J. “Framing and Ideology: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U.S. and Chinese Newspaper Coverage of the Fourth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Women and the NGO forum”. *Mass Communication & Society*, 1998, 1: 131-152.

- [13] Boettcher & Cobb. "Echoes of Vietnam? Casualty Framing and Public Perceptions of Success and Failure in Iraq Author".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2006 50(6) : 831-854.
- [14] Gross & D'Ambrosio. "Framing Emotional Response". *Political Psychology* 2004 25(1) : 1-29.
- [15] 周海英、徐晓红 《网络新闻专题框架分析——以人民网和新浪网禽流感专题为例》,《东南传播》,2010 年第 12 期。
- [16] 黄敏、张克旭 《关注台海——网络媒体关于 5·20 事件前后报道的对比分析》,《新闻与传播研究》,2000 年第 4 期。
- [17] 芦笛 《网络传播:打破新闻话语框架的新媒介》,《文艺生活》(下旬刊) 2011 年第 11 期。
- [18] 郭光华 《论网络舆论主体的“群体极化”倾向》,《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 年第 6 期。
- [19] 孙海峰、菟菡 《对网易新闻及新闻漫画的框架分析》,《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 年第 1 期。
- [20] 袁小轩 《从“周久耕事件”看网络舆论对报纸新闻框架的影响》,《新闻爱好者》2010 年第 2 期。
- [21] 如《联合报》2011 年 1 月 24 日署名为“田园火鸡”的人所发表的《政府应出面婉拒陈光标发现金》等文。
- [22] 如《自由时报》2011 年 1 月 26 日署名为“杨博修”的人所发表的《马政府 没路用》等文。
- [23] 如《联合报》2011 年 1 月 28 日署名为“颜士尧”的人发表的《救助没效率 弱势等到走绝路》等文。
- [24] 如《联合报》2011 年 1 月 27 日署名为“林琮”的人发表的《国台办:行善欲人知 宽容点看待》等文。
- [25] [28] [29] Yuqiong Zhou & Patricia Moy. "Parsing Framing Processes: The Interplay Between Online Public Opinion and Media Coverag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07 57: 79-98.
- [26] DiMaggio P. J. Evans and B. Bryson, "Have Americans' Social Attitudes Become More Polarized?"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96 ,102: 690-755.
- [27] 《自由时报》1 月 27 日的数据库收集异常,导致当日主帖和针对该主帖的回复数据没有收集到。将 1 月 27 日数据设置为缺省值再次检验,发现《自由时报》的报道量与评论量仍不相关($r=0.385$ $p=0.306$)。
- [30] Edelman M. "Contestable Categories and Public Opinion".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1993 ,10: 231-242.
- [31] Reta M.C. "US Media Coverage of the 1994 Elections in South Africa". *Gazette* 2000 62(6) : 523-536.

(责任编辑:张文生)

Beyond Blue and Green? A Study on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Mainstream Media Ideology and the Internet Public Opinion in Taiwan

Le Yuan , Liu Junlin

Abstract: This paper argues whether the rise of online public opinion could really in essence challenge the political discourse of mainstream media depends largely on the revolt of Taiwan Internet users against the frameworks set by traditional media coverage and their ability to influence the traditional media. Based on the case study of "Chen Guangbiao Event" which set off a storm of public opinion, the writer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produced by the Blue and Green political ideologies and the way to influenc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two when it comes to the discussion by both of the mainstream media and the Internet public opinion on a non-political event. The findings show that there exist some differences in attitude and framework between the media and the online opinion and the interactions as well between the media coverage and the online opinion in the middle of and later development of the event, while at the same time, the network public opinion begins to react on the coverage. Even though the media still has the ability to work out the agenda of the Internet opinion, it does not necessarily mean the better interaction effect of the framework. The study also affirms the ability of Taiwan netizens to challenge their traditional media, revealing more complex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in which the ideolog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Key Words: Taiwan, ideology, media, Internet public opinion, framework